



錢穆先生論佛

智銘

中國自漢武帝尊儒以來，儒者在政治、文學、哲學等各方面佔了很大的優勢。孔子本來是個很寬容的人，對於不同的學說不但不排斥，而是儘量去學習的。故說：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，擇其善者而從之。」對於不知道的事，必求其知道，故「入太廟，每事問。」因為他有這種不分彼此求取新知的好學精神，故能成爲萬世師表。

但，漢以後的儒者，多反孔子之道而行，對諸子百家採取鄙視排斥的態度，其對後來的佛教亦然。唐韓愈以聖賢自命，以儒者的正統自居而公然倡議排佛以後，至宋、元、明各代，凡以正統自居的儒者，莫不都有強烈的排佛色彩，凡是讀過「宋元學案」、「明儒學案」的人，我想：對我的說法，應沒有太多的懷疑和反對。

民國以後，「新文學」抬頭，佛學當然受到很大的衝擊，而儒家更被衝擊得遍體鱗傷。故民國以來，再沒儒者的排佛，甚至已無人敢明言自居於儒者了。如果有，那只有錢穆先生。不過，錢先生雖自居於儒者，但他並沒有繼承過去儒者排佛的態度，相反地，他對佛學有很多的提升，尤其指出佛學對中國思想的發展，有許多先見之明的說法。他揚棄了儒家反佛的傳統，而儘量揉合佛學與儒學的相同性。他的見解可由他「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」的講稿中看出來（註：錢氏於去（六七）年應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之邀，以此題發表六次演講，講稿刊於聯合報六八年六月十三日至七月十九日副刊）。現在選出其中與

佛教有關的論點加以介紹。

錢氏首先談到「述而不作」的問題，孔子曾說：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竊比我於老彭。」他認爲孔子一生只是稱述古人之言，而不自己創作，這種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的典範，二千多年來，已成爲中國人做學問的一種生命學。生命是一體相承的。因此，孔子的這一典範也是一體相承的。錢氏在敘述儒家一體相承的實例外，特別介紹了佛家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的歷史事實。他認爲中國文化傳統中並沒有產生宗教。佛教是自印度傳來的。自漢末以至魏晉南北朝而迄唐，經過了一段長時間的演化後，佛教已中國化，當時的天台、華嚴二宗，都有判教，所謂判教，就是把千年以來的說法，如釋迦怎麼講、馬鳴怎麼講、龍樹怎麼講，一路下來，中國的僧侶們都把它來分別判定。最後，都認爲是釋迦一人的說法，凡是中國僧侶們所知道的全部佛教經論，都歸納成一整體的佛說大系統。這種作法，就是中國的僧侶們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的表現，與儒家的精神一致。

三國時，魏人王弼在他的周易注周易略例中說了兩句話：就是說中國的思想發展，都是「統之有宗，會之有元。」的。錢氏對這兩句話特別著重。他認爲中國的思想史，無不是自「統之有宗，會之有元」發展開來，他以「明儒學案」爲例，舉出陽明一派，由陽明演變而成的「浙中王門」、「江右王門」、「泰州學派」等等，他們的說法雖有小異，而仍具大同，大家共同遵奉陽明一人，這就是「統之有宗」。講到「會之有元」，他認爲王陽

明雖是明代的一個儒者，但他的思想並不是他自己所獨創，而是與元、宋、唐、漢上溯至孟子、孔子，仍是一脉相承的。這就是「會之有元」。談到佛學的「統之有宗，會之有元」，錢氏認為印度是個沒有歷史觀念的民族，但佛教傳到中國以後，中國人創立了天台、華嚴、禪三宗。這三宗對佛教的歷史有很認真追求的態度，其中特別是天台、華嚴二宗，他們最大的努力，就是依照佛教的經典，編成了佛教史和佛教思想史。這在印度是沒有的。在所編定的佛教史及佛教思想史中，將佛教的演變及一切的思想、一切的理论，都歸納到佛陀一人身上去。這就中國學佛的人將佛教「統之有宗，會之有元」了。

談到中國人應讀些什麼書的問題；錢氏認為中國的高級知識份子應該讀七本書，那就是戰國時代的論語、孟子、老子、莊子，再就是唐以後的「六祖壇經」和朱子的「近思錄」、王陽明的「傳習錄」。「六祖壇經」雖是一部白話體的佛教經典，不信佛的人，也應該一讀，宋、元、明、清四代的讀書人，多讀此經。今天的西方人，讀過此經的也不少。所以，中國的近代人，自應該一讀。錢氏認為漢武帝曾表彰六經——詩、書、易、樂、禮、春秋。而上面列出的七本書，可以成爲中國的「新七經」。讀了這七本書，才知道中國思想史「統之有宗，會之有元」的眞義所在。他認爲中國思想發源的始祖，只有孔子、老子、釋迦三人。民國以後提倡「新文學」的人，爲了「創作」、爲了「開新」而反對孔子、反對老子、反對釋迦，認真地從中國的歷史看來，中國的國民性似乎不喜歡這樣做，要反對也是件不容易的事。看了錢氏的這些說法，使我們想起了一件事，說就是在讀歷史時，以前的儒者所編的四庫，「經部」方面只收儒家的經典，佛學經典只被收在「子部」內，而民國時代僅存的一位儒者——錢穆先生，他不但將佛陀提升到與孔子、老子並駕的地位，更將「六祖壇經」列入「新七經」之一，這不能不說是錢氏的高明之處。可惜的是，他的主張來得太晚，如果自韓愈以下的儒者早具錢氏的高明之見，不以排佛爲能事而力求佛儒的共同闡揚，則不但佛學在中國思想上佔有更高的境界和成就，而儒學也因佛學的滋潤而更發揚光

大，不致有今天的沒落了。這實在是佛儒兩家的雙重損失，不無惋惜之感。

談到朱子所說「通天人，合內外」的性命之學的問題，錢氏認爲中國人喜歡講通，喜歡講合，不喜歡講分、講別，耶穌曾說：上帝的事歸我管，凱撒的事歸凱撒管。」這種將政、教分離不能「通天人、合內外」的說法，終被釘死在十字架上，西方宗教過份注意內而忽畧了外，而今日西方的科學，又過份的向外尋求而忽畧了內，都失之偏頗。談到佛學，錢氏認爲：「佛教要人轉向身內求，離開外面事物，便成一無所知，亦有毛病。」關於這一點，錢氏可能僅站在小乘的觀點來論證。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這只是在修證時的一種認知而一時地「離開外面的事物」，但等到他一旦色、空兩遣的時候，又會回到「外面的事物」上來，做他救人渡世的工作。禪宗有一個公案，正可以說明這一點；這個公案的大意是：「未信佛以前，見山是山，見水是水，信佛以後，見山不是山，見水不是水，悟道以後，見山還是山，見水還是水。」這就說明一個學佛的人，在離開自然求得眞我以後又回歸自然。故菩薩成就菩薩道以後，仍回到世間事物方面來救苦救難。所不同的是，儒家的務世，講求與政治權力相結合——政教合一。而佛教則獨行其是，不太注意與政治相結合。但其不「離開外面事物」用心是一樣的。故大乘佛教仍是「通天人，合內外」的一群，而不是躲在象牙塔內的自了漢。錢氏在其結論中說：「担任孔子之道的士，是半個和尚，但也可以說是雙倍的和尚。」不管是半個和尚或是雙倍的和尚，士與和尚的職責是一致的，是相等的。都是以「通天人，合內外」以救人渡世爲職志的。我的這點說明，只是給錢氏談論此一問題的一點補充而已。

錢穆先生是中國近代的一大學問家，是中國道統的繼承者，他的成就顯然已超過兩朝所有的儒者，僅就其對佛教的先見而言，即較以往的儒者開朗高明得多。可惜錢氏春秋已高，對佛儒二教的揉合工作，不可能做得很多，但此文的提示，已值得吾人的重視，特爲介紹，用爲同道參考。